



中国

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

CHINA HISTORICAL POPULATION
DATA AND THE RELAVANT STUDIES

杨子慧 主编



改革出版社

**China Historical Population Data
and the Relavant Studies**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

杨子慧 主编
compilers: yang' zi hui

改 革 出 版 社

CHINA REFORM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107210
(京)新登字 05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杨子慧主编. —北京:改革出版社,1995.10

ISBN 7-80072-673-8

I. 中… II. 杨… III. 人口统计-统计资料-中国-研究
N. C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881 号

责任编辑 安建军
封面设计 张宝和
责任校对 高金利
监督印制 郝平生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23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燕郊中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1/16 113 印张 3700 千字

印数:1—600 册

定价:460.00 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 “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

项目主持人

杨子慧 王维志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田雪原 邬沧萍 漆 侠

项目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维志	王守志	王跃生
王俊祥	王洪春	王荣花
王虹桥	王建群	孙洪涛
卢俊业	刘淑英	刘永信
刘春燕	司 秀	江立华
任素华	伍晓晴	陈玉光
杨子慧	吴兆林	张 华
张庆五	吕红平	林其宝
宫 敏	高金三	黄凤岗
熊 郁	聂其岭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编委会

主 编
杨子慧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维志	王跃生	王俊祥
王守志	孙洪涛	刘淑英
刘永佶	杨子慧	张庆五
张 华	吕红平	林其宝

专家评审意见

之 一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大型系列专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全书共分八个分册,即《上古至秦汉编》、《魏晋南北朝编》、《隋唐五代编》、《宋辽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民国编》及《现代编》。

该专著搜集了上古至历代的人口数量、构成、分布、迁移、死亡、政策、思想、统计和管理、婚姻与家庭以及少数民族等原始资料,并分章进行综合性的论述。重点突出了各朝代人口发展变化的特点及其规律,是中国历史人口学方面的一部大型的权威性基础专著。各分册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理论性强,涉及面广,文字表述准确生动,重点突出。对认识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探讨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途径和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该专著是目前我国关于自上古至历代的**部历史人口学方面的著作。具有开创性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填补了我国人口学史研究的空白。据此,特推荐该专著,能予以资助出版。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前成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

袁 方

1995年6月22日

之 二

由杨子慧研究员任主编,由杨子慧、王维志研究员任项目负责人的大型专著《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是填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一项空白的力作。该专著自上古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代、清代、民国以及现代,对人口数量、分布、生育、

死亡、迁移、年龄结构、婚姻家庭、户籍管理、少数民族人口等各个方面,搜集了大量的珍贵统计资料,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深入分析研究。毫无疑问,这部专著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价值。据我所知,这部专著不仅在国内是首创,而且在国外对一个国家二千多年的人口统计资料的各个方面予以整理与分析研究的较大型专著也是十分少见的。

我愿意全力推荐,并建议资助《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出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曾 毅

1995年6月18日

之 三

杨子慧研究员主编的这部新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最终成果。

作者将我国历代分散在史籍、典章、奏书、经传与名人著述中的人口数据和人口史料按历史年代分类进行搜集整理、分析研究、编纂成系统完整的研究著作,对中国历史人口学研究有重要意义。如《上古至秦汉编》,是时间早、跨度大的一部著作。过去由于资料匮乏,很少有人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作者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分章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上古至东汉末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以及人口现象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构架。

这样系统完整论述的人口史书是迄今唯一的断代史类的人口学术著作,填补了我国历史人口学研究的空白。

本书中人口死亡分类、人口迁移特点、人口分布状况、婚姻家庭演变等,都是目前较完整的专题性研究,对历史人口学研究都有特殊意义。

本书资料主要来源于官修正史,并参考了各时期的子部各书、杂史、文集及后世类书、后人考证诠释、近人著述、近代考古资料等。这既补充了正史之不足,又增强了资料论据的确凿性和可信度。

我认为本书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于弘扬我国历史文化也有重要意义;文字清晰,有出版价值。建议给予出版资金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

沙吉才

1995年8月

之 四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系列专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研究项目,该专著共分八个分册。《明代篇》是系列专著的组成部分。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它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显著的发展;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多民族国家得到扩展与巩固,中外交往频繁,国内外贸易也显现出活跃,出现新的局面。

《明代篇》对人口活动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疆域、耕地面积、人口数量、构成、分布、迁移、死亡、管理、政策、人口思想及少数民族诸方面都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并作了综合性概述;文字表达清楚准确,重点突出。对研究明代人口是不可多得的翔实资料;对目前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亦有参考的现实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曾任副所长

杨钊

1995年5月24日

之 五

明代是我国历史资料比较丰富的朝代。在如此浩繁的资料中要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并从人口数量、分布、迁移、死亡、婚姻家庭、统计管理、人口政策、人口思想等方面加以搜集,分析、研究、论述,有相当的难度。作者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是难能可贵的。由于明代又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故其研究价值也非常重要。

全书共十一章,内容丰富,论述全面系统,深入浅出,立论有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所以,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人口史学研究的空白。

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前成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

袁 方

1995年5月24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

该书汇集了上古至现代的人口数据和资料,并归类分章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是目前国内关于上古至现代的第一本历史人口学专著,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

该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系统完整地再现了上古至现代人口演变过程,特别是对人口死亡的分类、人口迁移的特征、人口分布、婚姻家庭的演化等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揭示了人口现象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该书研究工作是在对数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著作权争议问题,故推荐申请出版基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蔡昉

1995年8月15日

总 论

一、引 言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最终成果。全书共八编，即“上古至秦汉编”、“魏晋南北朝编”、“隋唐五代编”、“宋辽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民国编”和“现代编”，计 360 余万言。

课题从立项到结项，八易寒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北京经济学院）、国家统计局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河北保定师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 34 位人口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专家教授及青年学者参与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基金和出版基金给予慷慨资助。全部研究工作工程浩大，时间、人力、财力所费不貲，终于完帙成卷，幸即付梓。毫无疑问，这项研究成果的取得是主管单位和有关单位领导重视支持，以及全体研究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作为项目主持人，谨向大力支持和资助研究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领导，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向坦诚指导研究工作的课题学术顾问田雪原教授、邬沧萍教授、漆侠教授，表示真挚的感谢；向热情关注研究工作并对研究成果作出公允评价的袁方教授、曾毅教授、沙吉才教授、杨钊教授，致以真诚的谢意；向与我精诚合作的同事和全体研究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在资料方面为研究工作提供方便和全力支持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资料中心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向热情帮助编审出版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和改革出版社的编辑、校对、排印人员致以深深的谢意！

此外，我还要特别提到：北京大学的仇维之教授在课题立项时曾出任课题的学术顾问，后因健康原因多次函告辞去顾问之职，并再三表示歉意；中国人民大学的孙天爵教授曾任分册主编，因事务缠身，多次要求不担任分册主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杨清涛教授，因健康原因，辞去研究工作；公安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数位理论工作者，因不同原因亦先后谢职，他们都为课题研究作了一定工作，宋黎明同志曾任课题秘书，前期作了一些工作，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盛世修史纂志（方志），乃我国之优良文化传统，是上承先祖、下惠后代的宏伟事业，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建设。中华典籍，类目繁多，浩如烟海。但从学科建设、学科分类和学科研究的角度考察，却不无遗憾，尤其是人口。为此，将几千年积累的中华人口资料蒐集起来，分类编纂，加以分析研究，无论对弘扬传统文化，还是对人口学的学科发展，都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80 年代以来，我同几位有志于此的学者，特别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与经济

研究所的刘淑英教授,几经磋商,拟设立这一研究课题。庆幸的是,这个研究意向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田雪原教授的热情关注和全力支持。在他的扶持下,1988年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重点科研项目;1991年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审议批准,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八五”重点科研项目。这就是本课题立项的初衷和简要的立项过程。

现在,八个年头过去了,课题总算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工作的结束,更重要的研究任务还在今后。如果我们的这项研究成果能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方便或借鉴的话,那就是对我们课题组全体成员面壁八年,青灯黄卷,故纸为侣的最高奖赏了。

二、研究背景和意义

历史人口学,是人口学科群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也是人口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广阔研究领域。研究历史人口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限于学术本身,而其最为价不可估者唯在资政、存史、教化、研究之功能。

先说“资政”。任何一国或一地区的人口都是不同时间出生人口的累积,或称之为历史人口的积淀。从人类学和生物遗传学的角度看,现实人口是历史人口的延续;现实人口问题是历史人口问题的扩展。因此,历史人口是现实人口的一面镜子。研究历史人口,以史为鉴,对于科学地总结和认识人口发展演变的规律,对于深刻揭示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对于探索和制定解决人口问题的方略,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映在人口问题上,何尝不是如此。太久远的且不说,即以近、现代中国人口问题而论,不仅早已为国内有识之士所关注,而且亦为国际革命先哲们所担忧。最有权威和最具说服力的要数马克思了。他在1850年讨论中国社会主义远景问题时就指出,在中国“缓慢地但是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七卷,第264页)。其时,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国总人口在1840年突破4亿大关以后,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开始进入低增长时期(参见本书“清代编”),但总人口仍在缓慢地增长。过剩的人口与落后的经济社会条件,使众多的人口陷入苦难深重的泥淖之中。马克思正是针对当时的中国人口问题,发表了上述宏论。然而,那个时候的中国执政者对人口问题并未引起重视;客观上也由于政局动乱、国事濒危,当政者无暇顾及。所以,人口和人口问题基本处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坐失治理良机。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制度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改变,人口死亡率率先下降,人口再生产由旧中国时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类型迅即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揭开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第二次大飞跃的序幕。许多有远见卓识的专家教授(包括政府里的一些领导人)以很大的理论勇气阐述了人口问题,提出了治理的对策和建议。但由于政治上的偏见和人口问题上的非科学思维,对已经出现的严重人口问题不仅讳疾忌医,甚而指鹿为马,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将报效祖国视为恶意攻击,以致贻误时机,使人口问题愈演愈烈。幸而7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了英明决策: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20多年来,全国上上下下花了很大力气,下了最大的决心,动手解决人口问题,才有了今天的局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为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创造了良好经济社会环境。否则,后果更难以预料(参见本书“现代编”)。由此不难看出,历史人口学研究的“资政”功能不可低估。

再说“存史”。历史人口学的“存史”功能不同于一般“方志”，具有其独特的一面。我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悠悠数千载，创造积累了丰富璀璨的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保留下来的史志典籍，浩如烟海，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内容极为广博繁浩。户籍、人口资料、人口思想及各种人口事件的载记，则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户籍、人口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无论其时间、内容和地域，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别是户籍文化，更为我国所特有。“户籍制度是伴随着国家机器的产生而产生的。自从有了国家机器，就有了赋税和兵役；有了赋税、兵役就要有户政，否则就无法了解人口数量和性别、年龄等资料，也就无法征赋税了。因此，我国户籍制度同人口数据资料几乎又是同步产生的”（杨子慧、张庆五《中国历代的人口与户籍》，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商朝以前，史书上虽然没有户籍一说，但有“登人”即临时征集兵员的记载。如殷墟甲骨卜辞“辛巳卜，贞，登帚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登人三千呼战”等等皆是。意思是说已征集一万或三千名士兵作战。商朝在开战以前，都要征集兵员，每次上千人上万人不等。兵员人数的统计理应来自各部落的人头登记。在甲骨书契中，已经发现20余处“册”字的象形字体，颇似考古发掘的简册。《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有人头统计了。这可以视为我国户籍制度的萌芽。在西周统治的300多年间，以周天子为中心实行的等级分封制，构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王室统治。统治者为了维护奴隶制度和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建立了比商朝更为完备的国家机器，同时也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可见周王朝已经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即“司民”；对生齿（男孩满八个月，女孩满七个月为生齿）以上的人，都要按不同性别登记户口，即“书于版”；并分城（都）乡（野、鄙）人口进行统计，这是我国最早的城乡人口划分；每年都要对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进行登记（著生去死），以便掌握自然变动情况；每隔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核实（即“大比”）；实行孟冬（阴历十月）上报全国人口数的年报制度。这些任务由司寇（掌握户籍的最高官）负责完成，年报也由司寇直接向周天子呈报。不难看出，周朝已经具备户籍制度的雏形了。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采用“编户”、“定籍”的办法管理户籍。如建立以户籍为主要内容的“书社制度”；建立了居民组织：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齐国）；建立“春曰书比，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之”的户籍核查统计制度；拟定专门的人口调查方案（《管子·问篇》中提出过详细的国情调查方案）。秦统一全国后，将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就开始在秦国实行的“户籍相伍”、“什伍连坐”推行到全国，并经商鞅两次改革，形成了更为严密的管理办法：（1）“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2）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3）令民为什伍，而相纠司连坐”；（4）“使民无得擅迁”（《商君书·境内篇》，《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可以说，到了秦代我国的户籍制度已相当完备了。刘邦统一全国后，汉承秦制，户籍管理又有发展。刘邦委任萧何作丞相。萧何编制《九章律》，其中的“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是第一次将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规范。此后，经过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的整顿户籍、制止脱漏，隋代的“大索貌阅”，唐代的“户婚律”，宋代的户分主、客和编户“鱼鳞册”，元代的“鼠尾簿”，明代的“黄册”，清代的里甲编户和保甲制度，国民政府的“联保连坐”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废止旧的户口制度，制发了新的户口簿册，建立了新的户口登记制度，等等，几经沧桑，展现出户籍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

至于人口统计数据、重大的人口死亡事件、迁徙、婚姻家庭、人口思想、人口政策等等史料,更是数不胜数。现存文献保留下来的全国人口数字是世界绝无仅有的;最早的人口思想,无论“增殖人口观”,还是“适度人口观”,都先于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所有这些,无不闪射出中华文化的光辉(详见本书各编相应章节)。

将上述散在于史志典籍中的户籍人口资料编纂成专门性学科著述,不仅在古籍整理中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户籍人口文化“存史”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有其独特的意义。据英国学人C·麦克维德推算(《世界人口地图集》),地球上从最早的人类(猿人)迄今已有300余万年了。公元前8000年(原始社会末期),全世界约有750万人,到公元17世纪中(1650年)才突破5亿,1830年增加到10亿,1930年增加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超过40亿,1987年达到50亿,2000年将超过60亿。中国人口在18世纪以前尚不足1亿,1711年突破1亿,1840年超过4亿,1982年超过10亿,1992年突破11亿,1995年初又突破12亿。在如此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记述人口发展的史学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憾事。这固然有其客观原因,一些文明古国如希伯莱、巴比伦等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一些古国又因为历史原因,人口资料残缺不全;而欧美等国则又因其立国不久,人口资料难以纵贯古今。唯有我国,在这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人口“存史”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我国学者的肩上。主观上的原因更为重要,这就是必须审时度势,选择好时机。就我国而言,历史人口同许多学科发展一样,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否则,即使是最美好、最善意的出发点也不会有好结果。所谓“乱世重典”、“盛世修史”,是历史的抽象。差可告慰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认识论、方法论、思维方式等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尽管这个时机来得晚了一些,但毕竟到来了,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时期。

关于历史人口的“教化”功能,则更是显而易见的了,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一,一部长达数千年的人口发展史,记录了中华民族的盛衰、振兴与发展,从中可以领略到这个伟大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与自然和自身发展的各种困难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及其无穷无尽的创造精神。单以人口调查、人口统计而论,我国古代的人口调查是世界各国中最全面的,同时也是建立全国统计报告制度和全国统一调查制度最早的国家。有许多国外统计学者把1748年在瑞典进行的人口调查当作举办人口普查最早的国家,然后是1754年奥国、1769年挪威、1787年丹麦、1790年美国分别所作的人口普查。甚至有人将1624年英国在其北美属地弗吉尼亚和1661年法国在属地加拿大进行的人口普查,视为先于瑞典的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之举。这是不确切的。其实这些国家的人口普查并不符合人口普查的基本要求,而且制度也极简陋,只能说是全国规模的人口计算或登记(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而我国从春秋战国开始,已经建立了详细的人口普查方案和制度。《管子·立政篇》内载有三种人口统计报表,即“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季报、半年报和年报)。《管子·问篇》中还提出一个详细的国情调查方案,问卷中共设立了60多个问题,其中涉及人口的就多达30余个,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权形式、户籍登记、人口统计等,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人口调查包括:(1)按贫富划分:贫困阶层包括鳏、寡、孤、独和疾病患者,以及靠借贷度日的困难户、富户的佣人、乡之贫民等;富有者包括债主、不事生产的人数。(2)按封建道德划分:品德好的包括安分守己务农的青年、以孝闻于乡里的民家子弟、兵官之吏、危难关头效忠国君的豪士、能以教化为人师表的士人等;品德不良的包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青年、结伙取乐之徒,以及违法犯罪受人歧视者。(3)按兵役状

况划分:适龄青年中已服役者、现役者、尚未服役者、过去牺牲了的先烈的子孙尚无田宅的人数、生活困难的烈士妻子和军属的生活状况等。(4)按职业划分:有农民、士人、从事园艺菜圃种植的人、能工巧匠、从事日用品和军用品生产的男女技术人员、手工作坊中的少女人数,以及农民人均能够提供多少人的口粮等。(5)按人口变动划分:出生和死亡人数、国内迁出和迁入人数、父母与子女分户另居的人数、本国青年流入其它诸侯国的人数、由其它诸侯国流入还没有土地和住宅的人数,以及在士大夫家寄居的其它诸侯国来的门客人数,等等。如此详细、周密的人口调查提纲,岂是公元17、18世纪西方国家组织的国情调查、人口普查方案所能及!自秦、汉以后,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制度更加完满规范。因此,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全国规模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的国家,是当之无愧的。弘扬这段文化史,并非一定要争个先后,而是可以激发我们民族和子孙后代自豪、自强、自奋的民族精神。如同四大发明和万里长城一样,我们在人口方面创造的辉煌业绩同样是激励我们永远奋发的精神力量。

其二,户籍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实际上也是数千年阶级关系、阶级矛盾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同样是一个旨在记录人口变动的管理形式,在不同阶级的掌握下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内涵。从奴隶社会的“登人呼伐”到封建社会的“料民”,户籍制度的功能由战争需要征集兵员演变为征收赋税和徭役。汉以后,又由征收赋税、田地统计、查漏脱籍,发展到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户籍功能由维护一般性的社会秩序、税赋制度、政权稳固和治国安邦的需要,转变为除此以外的更严酷的专政需要。民国时期封建买办的法西斯独裁专政,决定了户籍制度的性质和内涵。从整体看,民国时期的户籍制度既继承了封建时代传统户籍制度的内容,又抄袭了法西斯统治的内容,将二者溶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个历史阶段特有的户籍管理形式。例如民国18年(1929年)内政部颁布了《清查户口暂行办法》(立法院编《中华民国法规汇编》,中华书局1933年,第108~109页),通过户口调查,进行清乡查户。这个“办法”的第五条规定:“户口清查完竣,按邻取具连坐切结后,被查之户,如有“为匪”、“通匪”、“窝匪”或私藏枪械及其它危险物情事,同邻住户应受连坐之处分,连坐办法及切结另定之。”简单的一项规定,即可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户籍政策是以反共反人民的总政策为基点的本质内涵。国民党政府通过保甲清乡查户,搜捕民主爱国人士,迫害无辜。民国21年(1932)8月,国民党豫鄂皖军事当局公开发表了《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中华民国法规汇编》第170~179页),目的就是为了“剿匪清乡”。主要内容:(1)编组保甲,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保甲编户,清乡查口。(2)户长加盟保甲規約,甲内户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所谓“联保切结”,就是甲内户长连环画押,保证户为良民,绝无“通匪、窝匪、纵匪”情事;所谓“连坐切结”,就是各户联保之后,如一人犯禁,他人如不密报,就负有连同坐罪之责。(3)严密监视控制流动人口。各户户长遇有形迹可疑之人潜入者、留客寄宿者、外出归来者等等,都要及时报告。如有隐匿、知情不报者,必究罪责。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户籍制度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949~1952年是城市户口初建阶段,1950年制定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1951年7月16日由公安部公布实施。从1953~1955年,开始建立农村户口登记制度,1955年6月,国务院针对农村户口管理薄弱的问题,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户口登记行政由内务部和各级民政部门主管。1956年以后,开始改革户口管理制度。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是我国第一个户口登记法

规,是完全从我国国情出发,本着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适应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制定的。实施至今,对我国城乡建设和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户籍制度目前正处在一个新的改革过程中。

回顾这一段历史,同样对我们和子孙后代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其三,人口思想、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的产生、发展和深蕴的理论内涵,深刻地反映出聪颖智慧的中华民族在认识和掌握人口规律,运用人口规律改造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过程中所作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人口思想和人口理论都是极其丰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说明我国学者在认识人口现象、解决人口问题等许多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本书各编的相关章节,都辑入了丰富的内容,这里不再赘叙。值得特别称道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理论、人口政策的重大变革。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尽管人口思想、人口理论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重大的发展,但都没有脱却历史的窠臼,对当时现实人口问题的解决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只有当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创立以来,人类才真正找到正确认识人口现象、人口规律和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武器。这在我国体现得更为充实。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实践相结合,在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我国城市从1964年、全国从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尽管受各种因素的干扰,形成了“三起”、“两落”的局面,但终究第三起以后再没有跌落下来。经过短短22年的艰苦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创造了几个奇迹:一是只用了22年时间就使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由6左右下降到现在的2.0或2.0以下,低于更替水平,比发达国家快了半个多世纪。二是只用了22年时间,就使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同样比发达国家快了半个多世纪。三是只用了22年,我国就以比发达国家快一倍的时间迎来了人口老龄化。据预测,21世纪初我国将进入老年型社会。目前,已有上海,江苏省的如东县,浙江省部分市县,山东省的胶东半岛,北京市的东城区、西城区等一些市县进入老年型社会。老龄化的超前到来,为我国人口的根本转型、人口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及向人口现代化的迈进,开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和机遇。我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武器解决现实人口问题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国际社会所叹服,就连某些持有偏见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个事实。这些都表明,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取得了改天换地的伟大成就,同时在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改造中同样有能力战胜自己的弱点,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成为驾驭人类自身命运的主人,为世界的人口、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除上述外,还有很多方面可以体现出历史人口学的“教化”功能,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细述。通过这些历史史实的挖掘和传播,可以对我们的民族和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增强自豪、自强、自奋的意识,振奋民族精神。

最后说“研究”。历史人口学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曾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开拓历史人口研究,不仅对认识人口发展演变的轨迹,掌握人口规律,探讨人口、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内在关系和机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对历史人口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有重要学术价值。只有对历史的了解,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在。比如,传统观念认为,欧洲和英国的家庭规模都很大,结婚年龄都很年轻,在文艺作品中也有这样的描写。但通过历史人口研究发现,家庭规模并不大,核心家庭始终占主导地位,结婚年龄都很大,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年轻(C·Wilson,1994)。

20世纪初期,我国学者即开展了历史人口研究,多有著述问世。如黎世蘅的《历代户口

通论》(上海世界书局,1922年),徐沧水的《吾国人生之今昔观》(银行周报,1922年第6卷第36号),张荫麟《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东方1926年第23卷第2号),陈长蘅的《中国近百八十余年人口增加之速及今后之调剂方法》(东方1927年第24卷第18期),齐尔士的《千五百年前敦煌户口册与中国史籍上户口数之比率》(东方1927年第25卷第4号),陈长蘅的《洪亮吉之人口论及物竞论》(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金国珍的《中国历代户口概数考察》(新汉江1930年第2卷第2期),吴景超的《两汉的人口移动与文化》(社会学刊1930年第2卷第4~5期),碧莹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及其编制方法》(光明之路1935年第1卷第10期),傅安华的《唐玄宗以前的户口逃亡》(食货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4期),黄穀仙的《唐代人口的流转》(食货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7期),弢振辉的《东晋元魏诸代户口的逃隐和搜括》(食货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8期),陶希圣的《盛唐户口较多的州郡》(食货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10期),万国鼎的《汉以前人口及土地利用之一斑图表》(金陵学报1935年第1卷),王崇武的《秦汉户口与政治》(史学1935年创刊号),杨效曾的《汉末至唐户口变迁的考察》(食货半月刊1935年第2卷第10期),《中国历朝之户口统计》(未查到作者署名,史地学会1936年第3卷第3期),《明清时代的人卖与人质》(作者不详,史地学会1936年第3卷第4期),曹松叶的《战国秦汉三国人口述略》(国立中山大学历史研究所周刊,发表年不详,第10卷第119期),胡德煌《前汉户口统计表》(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2期),梁方仲的《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2卷第1期1935年),谭其骧《论两汉西晋户口》(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7期),张惠人《宋史地理志户口表》(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2期),劳榦的《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2分,1935年12月),袁震的《宋代户口》(历史研究第3期),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第8卷第1期,1949年),赵泉澄的《咸丰东华录人口考正》和《同治东华录人口考正》(齐鲁学报第1期和第2期,1941年),王士达《民政部户口调查及各家估计》(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3期,1932年9月),等等,限于作者见闻不广,所列篇目定会挂一漏万。仅此亦可看出,解放以前历史人口研究已有相当的建树。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人口科学研究中断了20余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人口科学才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在此背景下,本来就很稚嫩的历史人口学研究就越发门可罗雀了。虽然也有些学者瞄准了这个被冷落了但又有着开垦前景的研究领域,然而终因历史人口研究的重重困难而举步维艰,成就不够理想。80年代以来则发展很快,除发表了一些专题性论文外,也出版了诸种历史人口学研究及与历史人口有关的专著。最有影响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梁方仲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这是梁先生辞世前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为研究我国经济、土地、人口的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重要数据资料。如果说有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本书偏重于历史经济学,而人口只是一个与经济有直接关系的重要侧面,所以有关人口学方面的资料多为人口数量和家庭户规模,其它人口学的资料如死亡、分布、迁移、构成、人口思想、人口政策、婚姻家庭等,都没有涉及。当然,要求该专著有更多的人口资料并非梁先生之初衷,亦非该书之使命。

此外,还有田方、陈一筠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吴申元的《中国人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赵文林、谢淑君的《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翁俊雄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

陈荣编著的《河北人口史话》(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 1991 年),宋昌斌编著《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稿》(三秦出版社 1991 年),葛剑雄著《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陈景盛的《福建历代人口论考》(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杨子慧、张庆五合著的《中国历代的人口与户籍》(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1 年),顾鉴塘、顾鸣塘著《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孟昭华等编著《中国婚姻与婚姻管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陈国栋著《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姜涛著《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王跃生著《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年),〔美国〕段纪宪著《中国历代人口社会与文化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年),等等。

以上论著(尚有作者孤陋寡闻,目所不及者)从不同的层面、角度和时期,对历史人口的不同现象作了研究,较旧中国时期的历史人口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丰富了我国历史人口研究,为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毋庸讳言,我国历史人口研究与国际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无论研究方法、研究视野,还是研究深度及研究成果,都不尽如人意。这些都是历史人口“研究”功能有待发挥之处。

总括以上“资政”、“存史”、“教化”和“研究”诸功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概念,历史人口学无论作为人口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还是作为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都有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单就人口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而言,历史人口学分支也不可或缺,也需要扶持和培育,特别是加强该学科的基础研究更显其重要意义。本课题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而设立的。

三、方法和内容

本项目属历史人口学基础研究。确定这样的课题性质和研究方向,是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新中国成立前后历历数十年的历史人口研究,且不说专题性论文类,仅从专著类分析便可以看出,所有选题和研究角度都没有脱却局部和某一断面的局限,即使是一些“史”类的研究专著,时间或空间跨度似无非议,而内容涵盖则有失偏重,总有一些遗憾留下来。这个局面的形成,客观上反映出历史人口基础研究的不足或匮乏。因此,加强基础研究乃是历史人口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基本建设。

其二,我国历史人口数据资料之丰富,时间跨度之久远,空间范围之广阔,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但这些资料都散佚于古籍典章、官修正史及名人著述之中,至今没有蒐集会萃为一部完整系统的专业性著述,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多年来,课题组织者就有志于此,如果能够成就此端事业,不仅为古籍整理,弘扬我博大精深之中华文化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为历史人口学研究准备了基础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历史人口研究来说就更是如此。没有扎实深厚的基础功底为后盾,历史人口研究就难以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这方面,我国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一方面,在 19 世纪 40 年代以前,我国长期处于对外闭关锁国的状态,人口属于典型的封闭型,迁出国外和国外迁入的人口极少,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就为我们观察分析封闭社区内人口变动的客观状态提供了一个天成人就的良好条件。另一方面,修史纂志乃我国之优良文化传统,不仅尧天舜日要修史,战乱衰败濒危时期亦不忘大事记载。特别是不少王朝立“会要”或“实录”,人口史料记载更为翔实,时间延续亦更加严密。当然不可否认,这些史料也难免缺失或断载,也难免讹载讹抄,特别是有些王朝或因歌功颂德有意扩大口户数据,或因基层逃避徭役赋税而有意脱户漏籍,从而造成数据不实。尽管如此,仍不失其学术研究价值。